

华南综合新闻

HUANAN ZONGHE XINWEN

记者手记

世界“使者”

■李凤荷

采访完托·杜普里埃，笔者脑海里就冒出了“世界‘使者’”这四个字。5月初笔者在尼泊尔旅行时碰到他与女朋友陈碧娟，之后断断续续通过电邮和面谈来了解他的工作。说他是比利时人绝对不准确，因为他本身就是地球村人，今天在加拿大纽芬兰拍摄，明天就可能去亚洲某国。

托·杜普里埃跟中国的缘分很深。2001年托决定拍摄所有的世界遗产后就匆匆上路了，但对于怎样拍照片后来用于干什么都没头绪。他的第一站是莫斯科，拍了一点东西就坐6天7夜的中俄火车到了北京。托托跟笔者忆起北京还分外动情：“我就是在北京决定用全景拍摄的方式记录所有的世界遗产，在北京买齐了电脑、数码相机及尼康4500相机，然后在天津天天练习拍摄技巧。”之后的7个月，托托孤身一人跑了20多个省，“你们的火车棒极了，我搭那么多趟，没一次遇上误点。”当年的冬天托托在重庆病倒了，幸亏几个好心人把他送到医院，因此他深深爱上了中国。

因为拍摄世界遗产，托托失去很多，但得到更多。网站收到很多表扬信，如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地理老师给他写信道：“你的照片是我教学的好工具，学生们从你的网站了解世界。”有的来信则直接向他发出邀请：“我们这里是世界遗产一个点，你来吧，吃住我们负责。”的确，他在加拿大魁北克拍摄时住在一个网友家里，跟他们一家人交上朋友。

说起世界遗产，托托非常反感“哪里比哪里好”的说法，因为他觉得各地的文化、自然遗产都不同，无所谓哪里漂亮。把世界各处的好东西选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就是让人类共同欣赏、保护，而不是大家进行“选美”。也因为这个原因，托托坚持在照片上不写上介绍文字，以免他的个人观感影响了别人。

正如他在他的网页上一段话所说，了解、宣传、教育世界遗产，最好的方法是身体力行，到每处世界遗产感受当地的文化。托托本身就是超越种族、文化、国界的使者，从他的经历我们可以感受世界遗产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理念和意义。

泛珠三角社科院达成广州共识

本报广州8月17日讯 今天，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起，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社科院、海南省社科院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香港政策研究所、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等联合举办的泛珠三角省(区)社科院院长科研协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来自泛珠三角各省(区)社科院机构负责人20余人齐聚一堂，共商科研合作、推动珠三角发展大计。

会议讨论了泛珠三角省(区)社科院院际科研合作的宗旨和原则、领域和任务、机制和措施，达成了《广州共识》。《广州共识》同意建立泛珠三角省(区)社科院院长协作制度，院长科研协作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设会议秘书处于广东省社科院；建立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数据库，决定定期不定期交换科研工作计划，协调联合研究课题计划，交换与共享科研所需的知识、数据库等资源，鼓励科研人员跨地区开展重大课题合作研究，争取设立重大课题研究基金，在适当时候举办“泛珠三角前沿论坛”，共同打造“泛珠三角前沿论坛”的学术品牌。

(张荣)

物流巨头抢占珠三角商机 DHL与伯灵顿落户广州

本报广州8月17日讯 记者陶小淳报道：CEPA框架下第一家中国政府批准成立独资子公司的全球性物流服务供应商——美国三大物流公司之一的伯灵顿公司，近日在广州副市长王晓玲和伯灵顿公司、全球财富500强公司的美国布林克集团CEO米歇尔的共同见证下，将其在中国的物流运作中心设在了广州越秀区。

米歇尔表示，对于全球经济来说，中国已成为最大的推动来源。伯灵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涉足中国市场，到今天，其在中国14个地区已设立办事处，伯灵顿此次是要在中国开展高价值物品的库存管理与运输服务。

而在此之前，另一家国际物流、快递巨头DHL(敦豪)在广州的办事处已取得A级牌照，这是其在中国获取的第16个A级牌照。

DHL Danzas Air & Ocean 东南太平洋区副总裁梁启元先生表示：随着广州办事处取得A级牌照，DHL的拓展计划，是为了把握日趋频繁的跨境经济活动，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广州新机场通航所带来的商机。“过去数年，高科技、时装及零售业的客户对物流服务的需求节节上升，使DHL Danzas Air & Ocean在珠江三角洲的业务录得双位数的高增长。随着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我们必须相应提升处理量和客户服务。透过新的扩展计划，公司将更能把握未来的商机。”

“如今，一次性‘卫生筷’已成为外出就餐者或吃工作餐者的常用餐具。”

据了解，目前“卫生筷”不卫生现象在全国普遍存在。有关专家表示，对于一次性筷子，生产厂家一是要消毒，通过消毒把大肠杆菌等对人体有害的菌种杀死；二是生产过程中不能将有害的化学物质带到筷子上。而对于批发商，在流

入市场的最后一个环节更要严格把关。

“推出这项制度，是将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将物质利益分配与长久地考核警察操守连在一起，不廉洁者将得不偿失。”

——江苏省公安厅厅长黄明如是说。建立“廉洁从警退休金”制度，是江苏省公安厅在制度反腐上迈出的突破性的

一步。日前，该厅有7名老民警光荣退休，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取得了“廉洁从警退休金发放证书”及廉洁从警退休金。

“读者安坐家中，按照网上提示的步骤就可以轻松完成所需图书的预约和续借。”

——日前，广州图书馆开通网上预约、续借图书服务。读者只要通过登录

网站(www.gzlib.gov.cn)就可做到不出门也能预约、续借到图书。

“大多数人对地中海贫血防治意识差，很少有病人主动要求进行地中海贫血的筛查……”

——过去在广西，地中海贫血的筛查被列为婚检必查项目。在婚检由强行规定变为自愿行为后，随着婚检率的下降，好不容易对地中海贫血设立的一道屏障，一下子又失去了。有关专家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遗传病筛查的制度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尽量把体检、婚检内容和费用控制在群众易接受、能承受的范围内，从而提高婚检率和疾病普查率，以有效预防遗传性疾病。

引号新闻

新闻会客室

话题动机

被称为“百年一遇”的世界遗产大会7月刚在中国苏州落下帷幕，“申遗”和“保遗”一时间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就世界遗产的重要性而言，我们“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都不为过。若单纯为开一个大会，我们才把目光投向那些全世界珍之重之的宝贝的话，那才不像话。

世界遗产大会上的议题有28项之多，有的是专家研究的内容，有的则是市民大众都关心的题目——世界各地申遗的热情是否基于商业利益？申报成功以后是否就想着开发而不是保护？世界遗产是个人人皆可置喙的话题，因为每个地球人都拥有。托托·杜普里埃也是个最有发言权的人，身为多媒体摄影师的他与助手拿着一份世界遗产地图，每个点每个点进行拍摄。他眼中的世界遗产以及世界遗产保护是怎样的呢？就在托托·杜普里埃奔波于每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拍摄期间，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电邮、面谈采访。

嘉宾介绍

托托·杜普里埃：33岁，多媒体创作总监，比利时社会传播高等学院(IHECS)传播学硕士。他从事多媒体影像创作12年，曾导演一部短片，在东非拍摄3部纪录片，目前在世界纪念基金会和卡普兰基金会的资助下从事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的全景拍摄工作。

托托·杜普里埃：33岁，多媒体创作总监，比利时社会传播高等学院(IHECS)传播学硕士。他从事多媒体影像创作12年，曾导演一部短片，在东非拍摄3部纪录片，目前在世界纪念基金会和卡普兰基金会的资助下从事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的全景拍摄工作。

经济利益，世界遗产不能承受之“重”？

记者：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结束，其中谈得最激烈的一个议题是某些世界遗产项目被过度开发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托托·杜普里埃：的确如此，我觉得过度开发的严重性仅次于污染对世界遗产的影响。我到过中国不少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地区，了解到这么个问题：当地政府把“世界遗产”的称号，认作是旅游业的优质标签，而非保护人类遗产的责任。所以每当一个地区或景点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时，当地门票涨价，政府开始考虑在景点旁边兴建机场，而这些举动并不利于保护世界遗产本身。

记者：在你看来，世界遗产的标准是怎样？

托托·杜普里埃：我自己并没有能力和能力授予一个地区世界遗产的称号，因为认定一个“对人类有

世界遗产工作者在路上

独特价值”的地区涉及很多专门知识。一个地方要被列为世界遗产，它必须在审美、历史、本地和全球文化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等方面符合“对人类有独特价值”的要求。

我去过那么多世界遗产点，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你到那里，你会触摸到一点精神的东西，而这是每个地方所独有的。每个世界遗产点赋予人类一种使命感：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就是要创造，因为每个遗产点都带有生活的痕迹。

记者：你去过那么多世界遗产点拍摄，有没有留意到这个称号对当地经济的推动？

托托·杜普里埃：当然是。一个地区登上世界遗产名录，世界其它地方立刻对它刮目相看，这意味着数十亿人会知晓这个地方并产生兴趣，想去那儿参观。这股推动力不可估量。世界遗产目录会成为一些人所谓此生必去的地方。

世界遗产称号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同时也产生不少问题。以九寨沟为例，那里无疑是受到保护的，但九寨沟附近的部分山谷因为要容纳游客进入而被破坏。一个世界遗产点太注重经济效益并不利于教育游客，试想游客若发现当地只是盯着他们的钱包，这怎叫他们认识和欣赏这个地方独特的价值？

记者：在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有5个项目因保护不力等原因受到关注。你在中国拍摄世界遗产的时候，是否发现类似的问题？

托托·杜普里埃：每个地方的保护都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对于这些有上百年历史的“老古董”来说，中国在变化太快了，它们也许不能适应变化的速度和强度。就我来说，中国的所有世界遗产点都有受到变化侵害的潜在危险。

我认为中国需要做的是教育当地政府和在世界遗产点工作的人员。有些人在世界遗产点工作，他们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不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认定世界遗产)。另外，维护世界遗产需要专门人才，而这样的人往往很难找到。兵马俑出土的时候，带有缤纷的色彩，而仅仅过了30年，兵马俑的色彩已完全褪去。

不过，在中国也见到过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非常清楚世界遗产的重要性，很注重保护负责的区域。我对他们充满信心，只可惜这类人数为不多。

名额限制，世界遗产称号“僧多粥少”？

记者：世界遗产大会最后通过决议，要求每个国家每年只能提出两个项目的申请。你觉得合适吗？

托托·杜普里埃：我觉得委员会应该允许每个国家尽可能多地提出一些候选项目，以供委员会甄选。



嘉宾：托托·杜普里埃 记者：李凤荷 (图片由陈碧娟摄)

若你限制为两个项目，那委员会怎能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

记者：在这次世界遗产大会上，部分亚洲代表提出限制欧洲国家的世界遗产数目。作为一个拥有丰富历史经验的欧洲人，你怎么看亚洲代表的诉求？

托托·杜普里埃：我的确认为欧洲数以百计的世界遗产点已能充分代表欧洲的独特性，但同样我不认为项目的数量要受到限制。或许我们应该这样想：现在该是时候让西方国家了解其他地方大量的文化和自然瑰宝了。

记者：一些人提出，世界遗产应该与该国的人口看齐，潜台词就是小国家不应该占那么多世界遗产名额，如意大利拥有的世界遗产数目等同于中国。你觉得这意见在理吗？

托托·杜普里埃：人口与世界遗产数目完全无关。世界遗产是记录人类历史和地理发展的标记，我们用国别和人口来想这个问题，是一大谬误。

印度和中国共有23亿人，占世界1/3人口，这是否意味着这两个国家也应该占有世界遗产数目的1/3，就是说应该有250个世界遗产点而非现在的56个？不过，中印两国的面积远远少于地球面积的1/3，两国的不少地区人迹罕至，而在欧洲，每个地方都人烟稠密，这你怎么比？

谈到世界遗产，就是说在整个世界里具有历史和自然独特价值的地方，“独特”正是相对于“大众”而言的，所以人口与世界遗产完全不搭界。

周游列国，世界遗产摄影师是一份“优差”吗？

记者：你最近去过哪些世界遗产点拍摄？你的工作真让人羡慕。

托托·杜普里埃：我刚从加拿大东部拍摄回来，在广

东中山休息一下后就去苏州拍摄园林，之后会在上海住一个月整理前段时间拍摄的相片(一张全景照片要花上3个小时来做处理)。我3年前离开比利时开始环球拍摄，从一个世界遗产点到另一个世界遗产点。我会用特别的相机拍摄下世界遗产点的全景画面，然后用手提电脑处理图片(这工作由我的助手、女朋友陈碧娟完成)，然后沿途在酒店或网吧把图片传到网上(www.world-heritage-tour.org)。

我的工作确实可称为梦想的职业，因为在路上你会碰到不同的人，见到美丽的世界遗产。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不是什么“优差”，因为我只有很少钱(路费、摄影工具报损)，3年都没工资。建一个世界遗产图片库是个很辛苦很辛苦的工作！我现在没有家，没有车，没有孩子，没有宠物，什么都没有。我有的只是简单的行囊。说实在，注重实际好处的话，这不是什么好差事。

记者：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做世界遗产摄影？

托托·杜普里埃：2001年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被炸掉了，当时我就想要是自己能做点什么就好了。当年7月，一个机会来了，我带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目录开始了旅程，为所有的世界遗产留影，越濒危的越赶快去。世界遗产名单上共有730个，分布在125个国家和地区，而我目前只去了52个，仅占总数的7%。

记者：工作总是有苦有乐，说说你在路上难忘的事情。

托托·杜普里埃：去年12月我到了埃及拍摄，那里的古代坟墓已有10年没向公众开放，我很幸运地获得了批准进入拍摄。在里面我看到了一个最大且保存最好的坟墓，这段经历是我从事拍摄以来最激动的一次。此后我去了柬埔寨的吴哥窟拍摄，有人把那选为人一生必去的地方之一，我非常赞同。

2002年10月28日，我登上长城拍照，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尽管当时我孤身一人站在上面，但我感觉自己已收到一份难忘的31岁生日礼物。另外，在武当山拍摄也让我很难忘。我上山拍摄前一个月，上面刚遭火灾(由此可见我拍摄世界遗产的真正迫切性所在)。我很喜欢武当山，它保留了道教真髓在里面。我去过乐山大佛两次，希望再去第三次，佛像脸上的平和让我着迷不已。

记者：你预计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拍完这么多世界遗产？

托托·杜普里埃：应该要花10年吧，可能还要长，因为每年世界遗产的数目都在增加。未来的10年是我生命中的“游牧”阶段，我希望能用自己的真心和智慧完成这项有意义的工作。



四川向广州赠送《永远的小平》

8月17日上午，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广州购书中心，向广州市部分单位和驻军赠送了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而出版的新书《永远的小平》。解放军广州体育学院、广州市学联、残联等单位的代表接受了这份珍贵的礼物。《永远的小平》可读性很强，从家庭的角度介绍了邓小平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爷爷的一个个鲜为人知又感人的故事。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及子女对这本书的编写、出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让广大读者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伟人邓小平。

本报记者黎旭阳、杨文雯摄影报道

本报深圳8月17日电 记者黄日飞、通讯员周承强、邓念刚报道：一张张黑里透红的脸庞今天更红了，广东省政府、省军区领导给深圳市民兵应急分队的代表披红戴花，号召全省军民向他们学习。

13年来，深圳市民兵应急分队先后有62个单位、610多人立功受奖，其中1个分队荣立集体一等功，6个分队荣立集体二等功，23个分队荣立集体三等功，2个分队被中央军委和总参、总政评为先进单位；1人被授予荣誉称号，7人荣立二等功，

广东消防特勤队首次大比武

本报广东佛山8月17日电 记者黄日飞、通讯员徐尚明、黎夏舒报道：来自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等10个地级以上市的11支消防特勤队昨日开始云集佛山，首次举行全省消防特勤业务大比武。

比武首日，特勤队员首先展开了对破拆防盜网和绳索攀登两项比赛的争夺。佛山支队特勤中队夺得了这两个项目的“状元”。接下来全省消防特勤还将进行“消防蛙人”深水救人、高空紧急救人、化学灾害事故处置等7项“大比武”。届时，将产生8名“武状元”。

据了解，5月份以来，广东消防总队的近600名特勤队员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大练兵”活动。3个多月来，全省10个支队的特勤队伍均多次参加高层建筑、地下工程、石油化工、公众聚集场所等复杂火灾扑救和化学危险品泄漏、建筑物倒塌等突发事件的模拟演练。

广东部分监狱开设国家自学考试考场

本报讯 记者刘伯饶、通讯员廖翔华报道：记者从广东省考试中心获悉，报名参加今年10月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服刑人员有349人。

为了让监狱服刑人员获取知识、技能，重塑人生希望，经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从2002年起陆续在广东省内部分监狱开设国家自学考试考场，接受监狱服刑人员报名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到目前为止，在监狱内设立自学考试考场的有广州监狱、阳江监狱、东莞监狱、揭阳监狱、北江监狱、广东女子监狱、四会监狱、高明监狱、怀集监狱9所监狱，至今参加广东省自学考试的服刑人员达1300多人。

根据司法部第七十九号令《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的精神，广东省各监狱对服刑人员进行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开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已经成为服刑人员的强烈需求。

中央政法委、总参、总政高度评价深圳民兵应急分队受表彰

荣立一等功，另外6个单位28名个人分别荣立二、三等功。

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丁寿岳中将，广东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吕德松少将，副省长李容根，省军区政委蔡多文少将等领导给他们颁发了奖状奖章。

促进未成年人法制和思想道德建设 广东3万多中小学都有法制副校长

本报广州8月17日讯 记者黄日飞、通讯员刘洪群报道：据今天召开的广东省中小学兼职法制副校长工作经验交流会透露，目前全广东省已有31512所中小学，即中心镇以上中小学校和全部聘请了法制副校长，并力争在今年底做到所有普通中小学(含民办学校)的法制副校长选聘工作全部到位。

广东省普法办常务副主任、省司法厅副厅长何铭清介绍说，聘请法制副校长，广东是首创。“1996年，江阳市根据省普法办提出的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要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的要求，在全国首创聘请法制副校长的工作。”现在，聘请法制副校长，已经成为广东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

工作，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推选法制副校长由其所在单位推荐，市级主管部门审查，市综治部门审核后由市、区教育部门统一聘任；一名法制副校长最多兼任两所学校的职务，以保证有时间、有精力做好工作。深圳宝安区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部门的法律工作者担任法制副校长的比例占了49%。

学校也将法制副校长作为学校领导的一员，参加学校的有关工作会议，了解学校全局工作，将法制副校长的工作安排纳入学校工作的整体计划，并每年对法制副校长工作进行讲评、有总结，真正形成工作体系。各地还建立了法制副校长工作考核评比制度，由市综治办、教育局、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共同制定考评方案和标准，每年6月份对法制副校长落实责任情况进行考核。

何铭清告诉记者，根据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中央综治委等机关关于规范法制副校长工作的通知，下一阶段广东法制副校长的选聘、管理和使用将进一步规范化，使兼职法制副校长在加强中小学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转化后进生、预防中小学生违法犯罪、治理校园周边环境等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以抓好法制副校长工作为切入点，促进广东省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